

敬評范瑞平教授大作〈大疫當前：  
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兼論  
儒家義理與對新冠肺炎的  
道德分析

A Critique on Professor Ruiping  
Fan's Article and a Moral  
Analysis of COVID-19 and  
Ex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李瑞全

Lee Shui Chuen

---

李瑞全，中國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台北。

Lee Shui Chuen, Professor,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Philosophy, Taipei.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 159-16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159-166.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 Abstract

My response to Professor Fan's essay mainly deals with two issues. Firstly, through a simplifie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nd basic ideas of Confucianism, Fan's paper did not grasp the basic idea of "Ren" and "empathy of the Heart/mind of *ren*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ren-li-de*" in Confucianism. Hence, his thesis on Familism and Confucian Virtue Ethics was not based on solid Confucian texts and arguments. Secondly, Principlism is nothing as extreme as Fan described and his analysis on the Covid-19 pandemic are fairly rational and reasonabl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ndemic in the West does have serious defects,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inciplism and liberalism. It is mainly due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judgment of the nature of this new pandemic by specialists and common folks. Lastly, I present a brief outline on how Confucianism could join with democracy and liberty in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effectively performed by Taiwan people.

范瑞平教授就新冠肺炎的倫理反省而有的大作〈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一文，對於所主張的儒家的家庭主義固然一再發揮擴充和推展，此文更認真和推重近年流行的「儒家美德倫理」之說，以為是儒家文明所能貢獻於當前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的對治之優點，相對於西方的原則主義與自由主義在此全球流行病疫的偏頗失策，給予高度的評價。本文受邀就這方面試作一公充如實的回應，以就教於范教授和儒學與生命倫理學界之高明。本文以下列二個主題為言。

### 一、儒家之仁、禮、德之義理結構

由於儒學是中國文化與思想之主流，孔子立教即以繼承堯舜與三代的文化為主，且多正面發揚中國傳統經典與文獻中修己待人的禮義之統，且在之後三千年的發展中，有被尊崇為正宗的孔、孟、荀先秦儒學，與復興的宋明儒學，以及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當代新儒學，著述與文獻極多。因而對於儒學文獻的取材與詮釋，

實有極大的空間。但是，儒家卻也不是泛濫的學說，是在與佛、道、墨、法等諸家之對比而見出儒學的精神與要義，不可混同。儒學與西方哲學思想也自有可相容及相反之處，此亦必須有所掌握，更由於實與西方文化有不同表現，必須由此種種義理比對，方真足以彰顯儒學的思想與文化哲學的核心義理。孔子之後二千多年的儒者，基本上共認孔子立教是以「仁」為核心的義理體系。由仁指點仁心，仁心由對他人所感知的安不安而呈現；由踐仁而知天，而有天人合一的推展。三代特別是周朝，在文化貢獻上自是以周公之「制禮作樂」使中國成為禮義之邦，在中國歷史文化上的貢獻最為偉大。而孔子最重要的哲學開創是把三代的禮樂制度收攝在仁的基礎上，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即表示代表社會體制中的道德與政治制度，都必須以「仁」為基礎。近人最明顯表達孔子此一哲學思想核心觀念即所謂「攝禮歸仁」之旨。而仁主要的表現為對他人的苦樂與天地萬物的感應感通上，即表現而為仁心之安不安上。是以，孔子指出「為仁由己」、重視每個人之踐仁知天，發揚仁道的責任，故曰：「人能巨集道，非道巨集人」。而人之踐仁即成就仁德。由此而成為仁人君子，最高則為上與天齊的聖人。此實為儒家的仁、禮、德的三重結構和重點所在。故孟子必以不忍人之心，即不忍其他人其他生命受傷害之心為基礎，開展而為仁、義、禮、智四端，用以指導我們在生活中做人處世的實踐的基本原則；而由不斷踐行仁義禮智，而成就有德的人格，故而有大人、君子、聖人之位階。儒家重人之不斷提升自己的人格價值，因此崇尚美德。但美德不是首出或基礎，而是建立在仁心的基礎上，仁義禮智原則的實踐所成就的是道德人格。此所以本文認為范教授文中推崇儒家之美德之論固然不錯，但以西方美德論之以德行為首出則不合儒家之本義，也是不合理的理論。因為，人既不是生而有美德，則必須由實踐以成德，實踐必有所依據，即依道德原則原理而實行，實踐才真能成德，否則反會成為「德之賊」！西方現代文化漸失去追求人格

的理想性，美德論在實踐與原理上循環無解，故其美德論實是無根之論，只是空頭的理論構想，不切合人類生命之必須由實踐才可能成為有德之人的基本經驗。

由於儒家關切人之日用倫常的道德表現，因此對於人際間的關係有極深刻的反省。儒家講仁是從人與人之間的生命的同情共感開始，此即顯現為我們對他人的境遇困厄的深切的關懷。而人間的同情共感在愈親密的關係中愈具體而真切。人際間最重要和親密的關係莫過於在生命發展歷程中的自然表現，這一表現即在每個人都必須在他人照顧之下才能成長，即在一家之中的成長歷程。自然的家庭自是以具有血緣關係的父母子女為基礎。這也是一切生命的本性。由於長期的共同生活，而且在家庭中基本上是各盡自己的義務，而不是一種異化的政治關係，因而都是一種無私奉獻的親密的內在關係。父母之常為子女做的無償犧牲，是子女之能健康成長的關鍵。而子女之反哺盡孝，使老有所終，也是各盡本心之義務，完全不講利害。也沒有權利義務對立的表現。此所以儒家實是以家庭為一親密結合而不可分的單位，是以內在的家人結為一體，以全家作為社會政治的單位，以此回應社會、國家與天下的事務。而在德行實踐上，儒家也見出我們最原初實是從家庭開始，故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正表示我們的道德實踐，即「為仁」或「踐仁」是從最親近的人開始。由此推廣出去，而成為以社會、國家和世界各族人民為一體的「天下一家」的理想。此中自是以和諧共存為基本原則，但也必以平等博愛互相對。儒家重視人倫關係，但人倫已不限於家人，而必遍及所有人，因此，儒家並不以家庭為終點，故必經由家而國，而天下，以至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儒家之家庭實不限於血緣，因此可以有各種過繼、領養等結成與自然家庭一樣無分彼此的倫理關係。更由此推展而可涵蓋一切人與一切物，使天地萬物共成一家。這才是儒家的天下的情懷，無限的宇宙和諧的理想境界。至於如何處理此中的道德兩難，儒家又以「理一分殊」之「愛有差等」

原理、「推己及人」之「恕道」、「天下歸仁」的「仁道」來化解衝突，而不是出於私心自利的欲望和鬥爭。若停於以家為絕對，則只是鄉願式的基本教義派。儒家之尊崇禪讓，批評三代，反對家天下之論述，正是反對國家政治上的“家庭主義”和獨裁的極權主義的最明確觀點。

綜言之，儒家重視家庭，更重視每個人在修德上成就的德行與人格，發揮生命的價值。但這兩者都必須建立在人之為人，即人性的根基上。此根基即在生命之間所具有的親和感，同情共感，即仁心之感通上。「仁道」是儒家的核心觀念與價值根源，由此自可涵攝和保護家庭倫理，可以保彰德行之價值，保衛人性人道而不流於片面或偏頗的極端主義。扭曲或不正視儒家之普世主義，宇宙關懷，實是貶低了儒家義理之格調和宏觀的偉大的理想性。

范教授大文在引用文獻和參考的著作和論者都不是依於儒學的傳統而來。在文獻上不是基於孔門記述孔子之言行的《論語》，而偏取漢代公羊家之論，因而以孔子所刪編的《春秋》而論儒家義理，這在學術上是極不合理的詮釋方法。而且更漠視，以至完全不用《孟子》與宋明儒等二千多年來的繼承與發揮，《荀子》也只偶然被提及，這實近乎否定中國過去二千多年的文化傳統和歷史。本文在引用儒家的典籍上有意有所開展，這是本文的進步之處。但所引用的卻不是儒家的核心文獻和義理。如本文引用《周易》時也只用「家人」一卦，但此卦在傳統中實無甚義理之深度，而眾所常用認為是孔子詮釋《易經》卦爻辭最重要的「十翼」中的「繫辭」上下、「說卦」上下、「雜卦」、「乾文言」、「坤文言」等居然一句都不用，這顯是不能正視孔子之以仁義解說《易經》的意義。此實亦同於不能以《論語》解說《春秋》之有違學理學術的嚴重缺失。董仲舒之《春秋繁露》雜有陰陽家之說，以及諸如《呂氏春秋》之雜家之言，早已為歷代儒者所論證為有歧

出，不待贅言。因此。以這些文獻為主來說孔門義理，自是不能掌握儒家之核心義理，更常有違儒學之本義。

## 二、在疫情中，中西方生命倫理學與自由主義之 合理性與片面性

原則主義所繼承和代表的是西方文化與倫理學思辯的傳統，因而以現代個人主義和人權為理論的基礎。此自是與中國文化和儒家有重要不同之處，但兩者並不是不可相容的，實更可以有互相支援的作用。依儒家而言，原則主義是有偏差，但非對立的理論。在這次疫情中，許多生命倫理學家藉原則主義所尊崇的四大原則來分析，亦多合乎情理。這些分析論述不是效益論，更不是范文所指的極端的契約論的表現。理性討論是解決道德爭議的起步，至於難解的道德兩難，則引至基本的價值肯定和依據。儒家自必歸於仁義，立於仁心、不忍人之心，即生命的價值根源所在，而不能是中層的道德原則，更不能是某種主義。西方的倫理分析依於理性，最後也必以人道為依歸，原則主義歸於尊重個人之自主自律和尊重他人的權利，此中即有尊重每個人的尊嚴在內，並非極端主義或放任的自由主義。反之，停留於家庭主義或西方式的美德論或美德主義實不能回應當前的嚴重的疫情和疫情中的道德兩難的問題。若只憑家庭自主決定如何治理自己的親人，恐怕與范文所批評的極端個人主義更罔顧全體社會的公共福祉。至於范文指原則主義會有的極端表現，以至搞革命壓逼反對者，云云，似乎不是在說西方現代國家的實情。一者原則主義者從無涉及任何革命主張，二則西方社會現在已是推行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的社會，不知何需要極端的革命來“實現”之？

至於西方最初有國家要推行所謂「群體免疫」的方式來回應這次新冠疫情，在一個意義之下，這是根據現代的「流行病學」對疫症流行病的研究和理論而來，正是一種科學的評估和預測的推論。主要理由是由於這種普遍的流行疫症基本上無法控制，早

晚都會進到社區感染，之後只能由它自然消退。此中自有科學的依據，並無任何年齡歧視的問題。西方人也不是認為老人該死或不足惜而支持這種理論和政策，而只是認為這是人類生命的自然抵抗能力對流行病的侵襲所無能為力之處。此一由實然實證的科學推論出的政策的過程，主要是忽略了政策有應然上的選擇和決定在內。也許這次疫情我們可能無法逃脫最終的感染結果，但我們在道德上卻不能「見死不救」，特別是不能眼見親人受病毒之苦而不救——這正是儒家的親親而仁民的自然的義務要求。因此，儒家自然反對如此坐等病毒肆虐的「佛系模式」，西方社會最後也都全力去防堵病毒，沒有任由病毒肆虐到盡的方式。西方也有年青人認為自己身體強壯，不怕病毒，或認為這只是一種流行感冒之類，因而輕忽不理，以政治之自由權利來拒絕政府強制戴口罩，禁止聚會等限制令。此與西方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無關，更與原則主義無關。但由此而產生對社會公共安全的不顧，感染更多同一社區的人，則是極端自由主義的流弊。

至於西方人最初不願意無病戴口罩也是由於他們日常所接受的醫學教育而來，而病毒專家之所以認為戴口罩無用是因為病毒如此細微，不是一般口罩所能防避隔絕得了的。但他們忽略了口罩可以防止百分之八十的飛沫傳播，實比安全社交距離更有巨大的防止感染的功能。這是某些病毒學家忽略日常生活中感染常識所致，與科學之預測無關。

儒家反對「群體免疫」的政策是以正大和普遍的仁道的原則為據，此原則並不分老少，都同時重視對病者和家屬的倫理親情的義務而立言，對父母（實無所謂老不老的問題）之盡心盡力，孝敬奉養自是義所當為之事，沒有理由讓父母陷於可以減免的風險而不照顧。仁道對其他人的生命亦如是看顧，也不會增加別人的風險，所以也自願常戴口罩，以免自己成為隱性帶原者而傷害他人。風險即是一種害。這是儒家與原則主義相同的觀點。只是如何更進一步進行分析和得出合乎倫理的結果，則可能因前題上

的焦點或核心價值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和政策，以至所推行的政策是否得到人民遵從，則可以有文化與價值上的差異。台灣人民就很能掌握對親人和對社會整體的責任之擔負與共容的方法。因此，在早期即能接受指揮中心的超前部署和指引，人人願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減少大型公共活動，聚會中常戴口罩，勤消毒洗手，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自動自覺去報備自己類似的症狀和接受隔離，等等。這不但表現出公民的美德，也表現出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人的公民責任。這已超出家庭主義的局限了。

我很欣賞范教授在此明確表示不是不知道家庭主義的缺點，不致受蔽於自己的短處，只攻擊對方的缺點等等。但我認為需要平衡地看待他者，而我不免認為部份的詮釋和批評有過其實之處，故不辭捍格，強責於賢者而已。

##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李瑞全：《儒家生命倫理學》，台北：鵝湖出版社，1999。LEE Shui Chuen. *Confucian Bioethics* (Taipei: Legion Publisher, 1999).
- 李瑞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中的仁道：從文化與倫理看病毒疫情之啟示〉，《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1期，頁27-48。LEE Shui Chuen. "The *Dao* of *Ren*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A Revelation from Cultural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ume XVIII, Issue No. 1, 2020, pp. 27-48.
- 李瑞全：〈論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的倫理與人文課題〉，《鵝湖月刊》第538期(2020年4月)，頁16-26。LEE Shui Chuen. "On the Ethical and Humanity Issue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Legion Monthly*, Issue 540 (April 2020), pp.16-26.
- 范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81-107。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81-107.
- Beauchamp, Tom L. & James F. Childress. *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 Eigh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